

THE LITTLE DOOR TO

通向

新世界的

THE NEW

WORLD

〔新加坡〕范登博/著

小门

小

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认识。
中印两国将会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价值及机会,成为中、印走向世界的小门,也从中发展自己,获得经济利益。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通向新世界的小门

〔新加坡〕范登博 著

曹大鹏 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新世界的小门/[新加坡]范登博著;曹大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673-4

I. 通… II. ①范…②曹… III. 华人—社会发展
—概况—新加坡 IV. D634.3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6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TONGXIANG XINSHIJI DE XIAOMEN

通向新世界的小门

[新加坡] 范登博 著

曹大鹏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73-4/F·579

2006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 24.00 元

Alain Vandenborre (范登博)

THE LITTLE DOOR TO THE NEW WORLD

本书中文版经作者授权出版。

目 录

引言

中国和印度：两个巨人在前进 1

前言 8

第一章

从中国到印度：始于马可·波罗 16

第二章

花园城中自豪的中国人 30

第三章

在新加坡实现创业理想 56

第四章

与龙共舞 104

第五章

醒醒吧，中国人来了 158

第六章

中国热 178

第七章

中国市场宠儿之兴衰 218

第八章

一场悄然兴起的革命 236

第九章

中国与印度相会的地方 258

第十章

通向新世界的小门 272

附录 280

引 言

中国和印度：两个巨人在前进

2005年6月18日，南洋技术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组织了一次以“新加坡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为题的系列研讨会，其中也涉及了与中国的关系。以下为摘自前常务秘书和建屋发展局主席严崇涛（Ngiam Tong Dow）所致开幕词的部分段落。这些摘要首次发表于2005年7月4日的《海峡时报》上。

* * *

中国和印度都是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令人敬佩的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向世界“开放”了中国。另一个国家印度则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印度还落后于一些自然资源稍差的国家。

这样说恐怕是完全错误的，但我还是要冒昧地说，印度之所以发展滞后，是因为它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精英子女们拖了它的后腿。他们沉湎于费边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公正重于生产和生产效率。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与西方不同，但是中国政府却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教育。

两国各自的教育制度也许能说明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



中国的制度

在中国,自古以来,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就都得写实用论文,如治水。

考察和鼓励具有实用价值的思维促成了(南北)大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也许是有史以来人工开凿的最长、最成功的内陆水路;而中国的长城则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土木工程成果。

不幸的是,政治让中国吃了亏。中国未能阻止未开化的异族入侵。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作战本领和军事科学上更为先进。汉族中最杰出的人才却因为研读孔夫子的论语而变得麻木不仁。他们从伟大的土木工程师演变为诗人和画家。以往取得的成就已经过时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举行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但同样也被别人推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带着宗教般的虔诚研读毛泽东思想。一时辩论和宣传成风。斯大林的苏式工作服和工程学取代了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的运气。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以及目前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出身工科绝非偶然。

计划经济的桎梏被解除,注重实际的工程技术人员掌管了国有企业,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造。

印度的道路

印度与中国的差别是印度行政部门的男女工作人员所受的教育可以广义地称为哲学和政治学的古典式教育。他们是被培训为统治者而不是管理者。

印度建立了几所技术院校，为的是与法律和经济院校保持平衡，其规模无法与中国的教育相提并论。因此，中国同日本一样，在硬件制造方面超过印度；而印度擅长于外包各种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你是愿意在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当一名经济计划人员呢？

1959年5月，在新加坡的第一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PAP)一举获胜，在议会的51个席位中赢得了43席，普选票占53.4%成为执政党。李光耀总理面临的是经济停滞，城市里的贫民窟，高失业率和市政腐败。无论是申办出租汽车驾驶执照和小商贩经营许可证，还是申请批准设计和建筑，以及大量需要从行政官员那里申请的种种许可证，都要行贿，另一种说法是付给“喝咖啡的钱”。

10年前，即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无能而腐败的国民党赶出了中国大陆，迫使他们逃亡到台湾。中国是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贯依赖于自给的农业经济。于是中国求助于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中国向世界表明，那里没有失业。一个银行里的职位，在新加坡只要一个职员去干就行了，在中国却由四个人来分担。我在20世纪80年代去一家中国的银行把美元旅行支票兑换成人民币外汇券时，就当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1978年，邓小平巡视南方几个省，提出了“开放”政策。他举起的致富有理的大旗激发了成千上万人的创业精神。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打破了铁饭碗，把中国引入了当前令人惊异的经济发展阶段。

1959年，年轻的李光耀同样在新加坡也提出了“没人会白白养



活新加坡”的口号，从而激励了新加坡人奋发图强。

领导模式

但是，只有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经济才能飞速增长。政府强大、干练和廉洁才能使政治稳定。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模式？

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第一种是柏拉图倡导的“共和”模式。当时的人选择的领袖会是哲学家式的君主。他是平等之人中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的就是这种模式。在中国，党的领导挑选干部，干部再反过来选他为领袖。在这种制度下罕见政权更迭。领导人可能有变化，但党不变。

与之相对的是固定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制度。达到投票年龄的每个公民，一般是18岁以上，都享有一票选举权，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为议会议员(MP)。

议员人数最多的那个党的领袖组织政府。由于选举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四年或五年，这个国家的公民就不必以叛乱或流血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政府。

这种民主选举制度只有在公民充分了解情况并受过教育的条件下才能运作。如果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由能干而廉洁的男女领导的党，那就最好了。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他们必须坚信“国家只有一个”。

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领导政府的是一些能干、诚实、无私的男女。虽说给政治贴上标签可能有误导的作用，但我还是要冒昧地说，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们都是一些务实的社会

主义者。我认为邓小平先生和他政治上的同僚们也都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先烤制蛋糕

虽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两国的经济哲学思想却是基本上相似的，那就是先烤制蛋糕。两国的经济战略都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买得起的住房。

我国第一位财政部长吴庆瑞(Goh Keng Swee)博士有一天对我说，每当他在学校放学时经过一所学校，他就感到心情郁闷。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对我说，每年都有 23 000 名至 30 000 名毕业生离校，我们可怎么能为他们找到能赚到钱的就业岗位呢？

在 1960 ~ 1970 年这第一个经济发展的 10 年中，劳动密集型工业，如制衣、假发、半导体收音机组装和拆卸船只，帮我们渡过了难关。“高科技”、“低科技”这种术语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语汇。只要能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任何档次的技术都行。1960 年，失业率高达 10%。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已经达到经济学家称为充分就业的水准了，也就是说，失业率降至 3% 以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建屋发展局(HDB)清除了贫民窟和不通下水道的村庄，为我国 85% 的公民提供了居室。实际上，强大的经济提供的高额捐助养老基金储蓄导致住房与发展局建造了过多的住房，至今尚有一万套居室闲置。

1980 年，我陪同财政部长韩瑞生(Hon Sui Sen)前往北京与中国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准许在北京和新加坡设立贸易办事处，作为 1990 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遣机构。



我们拜会了邓小平。邓小平先生称赞新加坡经济的高增长率。当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 500 美元。邓小平先生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 400 美元。他的雄心壮志是到 2000 年时提高到 1000 美元。他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等于 1000 美元乘以 12 亿人口。如今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 美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 8% 的经济增长率,40 至 50 年后,将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新加坡的人口基数要小得多,达到充分就业也花费了 20 年时间。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城市里,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100 个李光耀

有一次我在中国财政部无意间听到三名来了解新加坡制定预算情况的官员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位说,新加坡和他们这个国家的区别在于新加坡只有一个李光耀,而在中国却有 100 个。他说此话的意思是,一位中国的副部长在政府结构中的权力运作要比在新加坡困难一万倍。新加坡的一位常务秘书经受的压力要比他的中国同行小得多。

虽说我们在新加坡推动一些举措要快一些,但我还得说,我们只善于短跑,而中国跑的是马拉松比赛。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多,人才也多。正如我的一位教授朋友所言,即使中国人不比其他种族的人更聪明,而且假定人口中只有一亿分之一是天才,那么他们每年也会出 12 位诺贝尔奖得主。当然啰,这个“如果”还要看他们能不能受到教育的培养来发挥出他们的潜能。

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国也有自身的负担。中国，不久之后还有印度，不仅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时也引起他人的恐惧。台湾将继续处于美国和日本的操纵之下，以使中国感到不安稳。一个被英国割裂的印度将永远处于分裂状态，因为有着两个敌对的地区。由于两个大国自身的负担，这两个亚洲巨人要从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2006年5月15日报道，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近期访华期间谈到：“对中国人来说，到新加坡来要‘容易’一些，因为许多华裔新加坡人是讲汉语的。同时，新加坡也有西方的思想和方法。”

2006年5月14日，李光耀资政对中国沈阳市委书记陈政高和市长李英杰说：“如果我们能为你们打开一条小小的通道，一扇面向西方和东南亚的窗，我们将很高兴这样做。这样做也将给我们带来好处和信誉。这是件双赢的好事。”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李光耀资政的观点与我本书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前 言

这是新加坡一个和风微拂、凉爽宜人的星期日。当王玉以 2 小时 43 分 51 秒的成绩冲过终点时，她的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高高地举起她的双臂。2003 年 12 月 7 日，这位原籍苏州、年方 19 的中国姑娘成为新加坡举办马拉松赛事 21 年来最年轻的女子冠军，她的成绩差不多超过了波兰顶级长跑运动员安尼拉·尼克尔和维尔莱特约 3 分钟。这是王玉第三次参加马拉松赛事。在此之前，她只是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参加过厦门和北京举行的马拉松比赛。所有的报刊都登载了她的照片。这是中国在新加坡大获成功的象征性标志。在终点，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体育部部长穆斯林雅可伯·易卜拉欣为她喝彩。欢迎来到这扇通往新世界的小门……

2005 年，中国和印度吸引了所有国家的目光。中国已成为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仅 2004 年一年就融资 640 亿美元，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 1 万亿新元（相当于 6 000 亿美元），其经济巨大的年增长率几近 10%。在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增长率更超过了 10%。中国设计优良价格又便宜的消费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用不了多久，中国制造的电冰箱、电视机、个人电脑和汽车将同日本或美国的产品一样，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一切消费型的电子产品的未来是属



王玉冲过终点时，雅可伯·易卜拉欣部长为她喝彩于中国的。联想集团并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全球个人电脑经营部，就是这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显信号。

就印度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其经济增长率稳定地保持在6%—7%。印度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值得自豪。一直兴旺的外包活动也正在改变其服务业的面貌。印度曾一度被描绘成身体庞大而行动迟缓的大象，如今却因为其经济规模已超过韩国，GDP达到7 000 亿美元，而被世界银行列入世界前10国之中。现在，投资银行谈起印度时，都称印度是亚洲新冒出来的一头“猛虎”，它掀起了一股革新的浪潮，创办起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公司，如诚信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印度斯坦集团(Industan Group)、巴帝企业集团(Bharti)、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捷达航空公司(Jet Airways)、威普罗技术



公司(Wipro Technologies)、兰巴克赛·塔塔集团(Ranbaxy and Tata Group)等。几年后,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迫使其制造业转向时,印度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个制造车间。印度显然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候选人,甚至在中国,这种观点也在引起重视。中国的决策者知道,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竞争者的崛起很可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那么印度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中国呢?

中国和印度再度崛起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将形成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如今,中国显然已经对本地区的贸易产生影响,因为中国激发了亚太地区出口的增长。自2003年以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都增长了大约40%,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新加坡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加上香港已成为新加坡居首位的出口市场,超过了马来西亚和美国。

2005年3月,北京允诺向印度尼西亚投资或贷款100多亿美元,帮助该国振兴经济,并就两国建立长远的和历史性的战略联盟与雅加达签订一项协议,其内容包括贸易、防务和技术等诸多领域。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2005年7月,印尼总统苏西洛礼节性地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回访。他在此次访问中获得了一项保证,即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2003年的13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300亿美元。中国已决心超过美国成为印尼最大的经济伙伴,并在此进程中改变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推动力。这还仅仅是亚洲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中的两国增强其相互关系的初起阶段。有朝一日,如果印尼为其未来的军事需要求助于中国,从而引发本地区军事战略上的结构性转变,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令世界上一些国家感到

惊恐。许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它们的未来是一件可怕的事。因此,中国必须承担起新的责任。为了应对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和国内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2005年7月,中国发出信号,表示它已决定重新评估人民币的价值,将其执行了10年不变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调整为较为松动的汇率体制,但是这一新体制仍将处于中央银行的严格管理之下。中国古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一直坚持说,中国是和平崛起。这一诺言表明中国明白其迅速发展会引起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如果中国能够制定一条避免冲突的战略的话(包括台湾海峡在内),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就可以成为东盟地区稳定和地缘政治平衡的一个因素。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印度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期推动中印之间突出争议的解决,随后又与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看来,希望是存在的。事实上,一切零星部件均已就绪,亚洲复兴的世纪的一切条件俱已齐备。在过去的八年里,这个地区一直处于一种修整和换代的状态。只是到了现在才看到国内的需求开始在本地区内兴起一种新的势头。中国成为这一动态的支柱之一,因为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者首次受到鼓励,将其积攒起来的储蓄用于消费,而不是被反复告诫的节俭。

10年前,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仅为3亿美元,到了2004年年底,贸易总额已突破130亿美元大关。由于中国和印度在进入21世纪后更加密切地互动,双方都重新发现了两国之间曾经绵

* 原文如此。我国引用此语时,必有“修身”。原文将“平天下”译为“make peace with the world”,似与原义不甚相符。作者将此解为“与世界和平相处”,故有后文“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之说。——译者

